

《詩人玉屑》之編印與宋代詩學之傳播： 詩話筆記之徵引與寫本印本之反應

張高評^{*}

摘 要

南宋魏慶之《詩人玉屑》，採錄宋初以來詩話、筆記等 180 餘種說詩學文獻，體現詩藝、詩格、詩法、詩病，堪稱集兩宋詩學之大成。其書徵引諸家，輯述而不評論，然去取詳略之際，予奪抑揚之間，已自有其裁斷與評價。本文考察《詩人玉屑》之編印與宋代詩學之傳播，從雕版印刷之為傳媒，與寫本相濟爭輝，促成「唐宋變革」切入；復坐實雕版印刷「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之種種便利，更借鏡谷登堡活字版印刷之所以為「變革之推手」，所生發之諸般傳媒效應，創意詮釋，轉相論證，以見寫本印本之二元傳播，助長了宋詩之疏離唐詩，催生了唐宋詩之異同，促成了「詩分唐宋」之趨勢。此從《詩人玉屑》徵引《苕溪漁隱叢話》、《王直方詩話》、《誠齋詩話》、《白石詩說》、《陵陽室中語》、《東坡詩話》、《復齋漫錄》諸詩話，大多推尊陶潛、杜甫，宗師蘇軾、黃庭堅，取徑江西詩法，所謂「媒介即信息」，此中自有傳播與接受之消息。至於徵引《石林詩話》、《臨漢隱居詩話》、《雪溪詩話》、《滄浪詩話》，與上述詩話異調變奏者，則是南宋詩學之回授反撥。自《石林詩話》而《苕溪漁隱叢話》；從《誠齋詩話》、《白石詩說》至《詩人玉屑》，宋代詩學注重詩藝、詩法，其消長、形成，與宋人審美追求「法式規範」大有關係。

關鍵詞：《詩人玉屑》、傳媒效應、詩法詩藝、宋詩宋調、唐宋變革、接受反應

^{*} 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一、魏慶之《詩人玉屑》之編印與傳播

宋人編寫詩話，哀集成編者不少。流傳至今者，以阮閱《詩話總龜》、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魏慶之《詩人玉屑》、蔡正孫《詩林廣記》卷帙最爲宏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總龜》蕪雜，《廣記》掛漏，均不及胡、魏兩家之書。仔書作於高宗時，所錄北宋人語爲多；慶之書作於度宗時，所錄南宋人語較備。二書相輔，宋人論詩之概亦略具矣。」¹觀此，可知諸家詩話總集之精粗偏全。

魏慶之，字醇甫，號菊莊，南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度宗咸淳八年，1272？）前後在世。²福建建陽崇化書林人，擔任建陽書坊編輯。亦能詩，著有《菊莊吟稿》，已佚。慶之隱居建陽刻書中心，藏書家多，古籍刻本豐富，於是參考斟酌 180 餘種詩學文獻，「博觀約取，科別其條」，編成《詩人玉屑》二十卷。³《詩林廣記》以外，宋人三部詩話總集，當以魏慶之《詩人玉屑》影響最大，評價較高。其詩學見解，體現於編輯體例與選材趨向中，輯而不作，並不直接呈露。黃昇序《詩人玉屑》綜述詩話對閱讀者之啓益；謂：「凡升高自下之方，繇粗入精之要，靡不登載。其格律之明，可準而式；其鑑裁之功，可研而覈；其斧藻之有味，可咀而食也。」南宋與宋代詩學重詩格詩法之特色，此中翻檢可得。黃昇於〈序〉中推想《詩話》刊行之影響，勾勒《詩話》傳播之效應，略謂：

方今海內詩人林立，是書既行，皆得靈方；取寶囊玉屑之飯，淪之以冰甌雪盃，薦之以菊英蘭露，吾知其換骨而僊也必矣。（魏慶之《詩林玉屑》卷首，黃昇叔暘序）

黃昇序作於淳祐甲辰（1244），知《詩人玉屑》成於理宗淳祐間；而南宋建陽黃昇二十卷刊本，即是《詩人玉屑》最早之刻本。此書之宋代刊本，有刻於湖南之十卷本，及清道光間古松堂重刻宋刊二十卷本。⁴可見，是書當時已頗流行。詩話發展至南宋，已由論詩及事，轉化爲論詩及辭，《詩人玉屑》體現當時詩話風氣，十分強調詩格詩法，被奉爲「詩家之良醫師」。⁵自卷一至卷十一，多以詩格詩法或藝術技巧分類，《詩人玉屑》之論詩及辭，

¹ 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10），卷一百九十五，集部詩文評類一，《詩人玉屑》二十卷〈提要〉，頁 4098。

² 張健：〈魏慶之及《詩人玉屑》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5），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第 10 期，頁 123-167。

³ 方彥壽：〈福建最早的詩話總集——魏慶之的《詩人玉屑》〉，《福建古書之最》（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1），頁 370-371。

⁴ 郭紹虞：《宋詩話考·詩人玉屑》（北京：中華書局，1985.4），頁 108。

⁵ 黃昇：〈《詩人玉屑》·序〉稱：「詩之有評，猶醫之有方也。評不精，何益於詩；方不靈，何益於醫？然

已然體現南宋詩話之風氣。與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著重論詩及事，兼及論詩及辭，代表南北宋之際詩話轉型之風氣，自有不同。

蓋詩話論「格」說「法」，揭示文法津梁，最便於學者掌握詩歌創作規則。此種注重法式之風氣，由晚唐五代詩格而來。⁶經北宋《天廚禁臠》、陳應行《吟窗雜錄》、南宋《三體唐詩》、《白石道人詩說》、《滄浪詩話》、《詩人玉屑》繼踵發揚，先後不絕。江西詩風提倡詩法，故南宋詩話之反應如是。觀黃昇之序，謂「是書既行，皆得靈方」，「吾知其換骨而僊也必矣」；與黃庭堅提示詩法「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陳師道論詩，所謂「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⁷皆強調書卷學問對詩人創作有觸發之功。假如南宋雕版印刷未如是之繁榮，刊本未如是之昌盛（詳下節），徒賴藏本寫本鈔本之傳播，宋代著述評論，將是另一番景象。詩話之作，確為「詩歌創作之經驗總結」，且為一代詩風士習之表現，亦由此可見。

郭紹虞曾言：「宋人論詩，大都重在藝術」；「宋人談詩，要之均強調藝術技巧，罕有重在思想內容者。」⁸《詩人玉屑》二十卷，前十一卷大多論詩及辭，不憚其煩揭示有關創意與造語之技巧與法式，其中如卷九所錄「白戰體」，頗示宋人因難見巧之創造性思維；卷十所錄「言用不言名（體）」諸詩話，亦體現宋詩致力於「不說破」，盡心於「繞路說禪」諸創意與造語工夫。⁹其他各卷所謂詩法、句法、初學蹊徑、命意、造語、下字、用事、煅煉、沿襲、奪胎換骨、點化、變態諸名目，或論鍛鍊與造語，或說沿襲與點化，或追求變態與自得，要皆藝術技巧之反應。由此觀之，宋詩宋調之風尚與習氣，《詩人玉屑》一書，頗有總結與體現。

魏慶之《詩人玉屑》，雖纂集他人詩話以為書，然去取從違之間，自有別裁心識。如是書全錄嚴羽《滄浪詩話》，亦全錄姜夔《白石道人詩說》，由其認同選取，可見其詩藝觀念與論詩宗旨。《詩人玉屑》之編寫傳播，除體現南宋詩學風氣外，且有徵存散佚詩話之貢獻，如陳知柔《休齋詩話》、黃昇《玉林詩話》、佚名《藜藿野人詩話》等，元明已散佚之書，多保存於《詩人玉屑》中。其次，則又提供《滄浪詩話》之校勘價值，《詩人玉屑》成書於《滄浪詩話》之後，元韋居安《梅磴詩話》曾推崇《詩人玉屑》：「類編精密，諸公稱之」；

惟善醫者能審其方之靈，善詩者能識其評之精，夫豈易言也哉？」《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71.7）之為書，評精而方靈，遂推崇為「詩家之良醫師也」，頁2。

⁶ 張伯偉：〈詩格論〉（代前言），《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7），五、宋代以後的詩格概觀，頁21-25。

⁷ 張高評：〈自成一家與宋詩特色〉，《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5.9），「以仙道為詩」，頁103-106。

⁸ 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2），頁25；參考郭紹虞：《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73），《詩病五事》提要，頁10。

⁹ 張高評：〈《詩人玉屑》論言用不言名—不犯正位與創意詩思〉，《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第23卷第5期（2009），頁47-52。

¹⁰郭紹虞《宋詩話考》上卷言：「每覺是書（《玉屑》）所引，較今傳各本為勝」。王夢鷗教授亦斷定：魏慶之「鈔錄在卷之一的嚴羽〈詩辨〉之文，當較後代流傳的任何通行本《滄浪詩話》可信。」¹¹郭紹虞《滄浪詩話校釋》，善加利用，以證成其說，良有以也。

《詩人玉屑》黃昇二十卷本，大抵刊行於宋理宗淳祐四年、至六年間（1244-1246）。由於日本入宋僧之攜回傳播，於是在醍醐天皇元亨二年（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五山時代（1192-1602）禪僧玄惠刊刻《詩人玉屑》，成為和刻五山版流傳之始。¹²《詩人玉屑》標榜詩格、詩律、詩法等形式技法，與入唐僧空海（吉備真備）《文鏡秘府論》編纂體例異曲同工，審美趣味殊途同歸，日本僧人於眾多宋代詩話中欣賞《詩人玉屑》、及周弼《三體詩選》、方回《瀛奎律髓》，當非偶然。影響所及，元代楊載《詩法家數》、范梈《木天禁語》、《詩學禁脔》等，要皆標榜詩法，多達十三種。¹³江戶時代（1603-1867）日本詩話大盛，大抵多「論詩及辭」，談詩格、說詩法者多。宋、元、明以來，《詩人玉屑》循海上書籍之路傳播，自有關聯。¹⁴

二、印刷書之普及與其傳媒效應

（一）宋代圖書流通促成唐宋之變革

自宋初太宗（939-997）注重訪求圖書，「遺編墜簡，宜在詢求」；「補正闕漏，用廣流布」，蓋朝廷以為「教化之本，治亂之原」，當取法圖書典籍。其後真宗、仁宗諸朝以來遵循故事，積極廣收圖籍，訪求亡逸，校定譌謬，募工傳寫，設官綜理，庶成其事。或以之置藏宣和殿、太清樓、秘閣三館，或以之鏤板刊行，化身千萬，到南宋紹興年間，三館藏書之盛，方能如此豐富。據文獻記載，兩宋官方古籍整理之圖書，無論刪繁補闕、重編新錄；或借本繕寫，精心讎校，終皆進呈三館典藏，¹⁵其中有藏本和印本之分。所謂藏本者，大抵皆為

¹⁰ [元]韋居安：《梅磴詩話》卷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頁564。

¹¹ 郭紹虞：《宋詩話考·詩人玉屑》，同註4，頁241-242。王夢鷗：〈嚴羽以禪喻詩試解〉，《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84.2），頁380。

¹² [宋]魏慶之撰：《校正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71.7），附錄〈寬永本卷後題識〉，錄玄惠、尹炯、王國維三家之題跋，頁602-604。

¹³ 張健：《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¹⁴ 所謂「海上書籍之路」，指唐宋元之漢籍傳播，依循明州（寧波）到日本博多之海上航線交流；明清時期，則改由江南到日本長崎航道，中日間漢籍之輸出與回傳，千餘年來多仰賴之。參考王勇：〈絲綢之路與「書籍之路」——試論東亞文化交流的獨特模式〉，王勇等：《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0），頁10。張伯偉：〈論日本詩話的特色〉，《東亞漢籍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7），拾貳，頁381-401、429。張伯偉：〈清代詩話東傳日本之反響〉，《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7），第六章，頁215-253。

¹⁵ 參考李更：〈圖書校理運作分析〉，《宋代館閣校勘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6.3），第三章，頁91-161。

寫本或鈔本，訪得善本，「鋟版以爲官書」者有之；公藏典籍能刻板雕印者相對於寫本，亦顯然有限，絕大部分的藏本都是寫本、鈔本。

真宗仁宗朝推廣雕版印刷，已略具規模；至宋室南渡，高宗詔令「監中闕書，次第鏤版」，於是在南北宋之交圖書傳播，印本與寫本交相爭輝，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可以考見。由於商品經濟之繁榮，促使南宋刻本書激增，刊書地點擴展。考趙希弁撰成《郡齋讀書志·附志》於淳祐九年（1249），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完稿於淳祐九年致仕後，二書之所著錄，「刻本書超過了寫本書」，成爲圖書流通、知識傳播之主角，時當十三世紀中期。¹⁶考察刻本由崛起、繁榮，到與寫本相互爭輝，到刻本書數量超過，甚至取代寫本，獨擅勝場，其中除朝廷科舉取士之右文政策外，自有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催化與促成在。

學者研究指出：印本增多，便利私人藏書；印本崛起，對寫本、閱讀、庋藏，以及前代詩集整理，多有影響。而且書籍之廣泛流通，必然影響當時之思想與文學。¹⁷不過，搢紳家所藏稿本寫本善本，經官方雕印頒行，既可廣祕府之儲，且以傳播天下，有益圖書之流通。論者稱：「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於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藏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所謂「士大夫不勞力而家有舊典，此實千齡之盛」，誠非虛言。金鉞《漢唐以來書籍制度考》亦云：「至板本盛行，摹印極便，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固亦有功名教矣！」¹⁸印本使用之便利，傳播之快捷，知識流通之迅速，無論聖經賢傳，子史文集，多因此而容易「家傳而人誦」，既有功於名教，自亦影響宋代之學術風尚。

依據《宋史藝文志》統計：宋初開國，圖書才萬餘卷；仁宗慶曆十一年（1041）纂修《崇文總目》，已著錄藏書三〇六六九卷；終北宋之世，圖書目錄，凡六七〇五部，七三八七七卷。¹⁹靖康之難，書亡滋多。紹興間詔求遺書，獻書，於是圖籍漸備。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編次《中興館閣書目》，著錄藏書四四四八六卷；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編修《中興館閣續書目》，再著錄一四九四三卷。《宋史·藝文志》所著錄四部典籍，共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以宋代目錄專籍而言，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私家藏書版本，多達3000餘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1492部，24500卷。陳振孫《直

¹⁶ 宿白：〈南宋刻本書的激增和刊書地點的擴展〉，《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3），引王重民之說，頁106。

¹⁷ 艾·郎諾：〈書籍的流通如何影響宋代文人對文本的觀念〉，沈松勤主編：《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10），頁98-114。

¹⁸ 〔清〕徐松輯，苗書梅點校：《宋會要輯稿·崇儒四》（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9），引《孝宗會要》淳熙十三年丙午，頁259。章權才：《宋明經學史》（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9），第二章第二節〈鑄版印刷的發明與經籍的廣泛傳播〉，引吳激說，頁58。金鉞：《求古錄禮說》，袁詠秋等：《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讀敘傳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12），頁178。

¹⁹ 〔元〕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二百二，〈藝文一〉，《二十五史》點校本，頁5033。

齋書錄解題》著錄圖書 3096 種，51180 卷。周密《齊東野語·書籍之厄》，載兩宋私人藏書，少則一、二萬卷，亦有多至十萬卷者，皆不計在內。圖書質量倍數成長，除傳統之寫本（稿本、抄本）外，其中自有印本之書在。宋代刻書業興盛，不僅前人著作陸續開雕傳世，以供研讀借鏡；即當代作品亦多印刷成書，因得流傳後世。宋代之版刻，對於書籍之流布，知識之傳播，貢獻極大。詩話筆記因時乘勢，自然得心應手，容易水到渠成。

錢存訓首倡印刷文化史之研究，曾大膽推測：「印刷術的普遍運用，被認為是宋代經典研究的復興，及改變學術和著述風尚的一種原因。」²⁰佛郎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標榜「知識就是力量」，曾推崇印刷術在文學之影響力，媲美火藥在戰爭，指南針在航海方面，對全世界面貌和狀態的改變。試考察谷登堡（Gutenberg Johann, 1397-1468）發明活字版印刷術，於中古歐洲，改變了閱讀環境，影響了接受反應，加速了古老變革，重組了文學領域，催生了創新體類，當然徵存傳播了更多的傳統典籍（詳下節）。對照東方宋朝，雕版印刷繁榮發達，形成印本文化，相較於傳統寫本之仰賴手抄謄錄複製圖書，印刷圖書之為傳媒，所生發之效應有何特殊處？清張之洞《書目答問·勸人刻書說》謂：刻書可以「傳先哲之精蘊，啓後學之困蒙」，對於文風士習，究竟將造成那些影響？

宋初開國之君，多尚文崇儒。宋太宗蒐集圖書，謂可以「勤求古道，啓迪化源」；強調「教化之本，治亂之源，苟非書籍，何以取法？」²¹於是繼續五代印刷圖書之事業，從事佛教《大藏經》開寶藏之雕印，國子監《七經》、《十七史》之精校刊行。風氣既開，於是官刻本之外，又有家刻本、坊刻本之倫。由於有利可圖，蔚為「天下未有一路不刻書」之盛況。於朝廷官方，要在提供「宣索賜予，興教濟眾」；而官刻、家刻、坊刻，亦無非期盼「布之四方，圖永其傳」。²²本來，整理古籍，傳播文化，漢魏以來歷代多所提倡，宋朝並非首創。不過，宋人除寫本之傳播外，又推廣雕版印刷圖書。論者以為：「宋代在通過當代（雕版）技術，使文化傳統得以利用，以及對『學』的傳播上（這些標準本文獻被傳播到州和縣），都超過了他們的五代前輩。」²³圖書傳播挾雕版印刷之優勢，席捲文學界與學術界，如此激盪衝擊，必然引發「變革」性之影響與轉型的發展。

在西方，印刷術被稱為「神聖的藝術」，「文明之母」，又號稱「變革的推手」；在東方日本，坂本太郎《日本史》亦稱贊印刷術，「是普及教育、普及文化的有力手段」；張秀民

²⁰ 錢存訓：〈印刷術在中國社會和學術上的功能〉，《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5），第十章（四），頁 356。

²¹ 〔清〕徐松輯，苗書梅點校：〈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同註 18，頁 234。

²² 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期（2008.4），頁 195-202。

²³ 包弼德（Peter K.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T'ang and Sung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1），第五章〈文治政策與文學文化：宋代思想文化的開端〉，頁 158-160。

《中國印刷史》既標榜宋代，推崇為「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²⁴則於南北兩宋生發之傳媒效應，較谷登堡之活字印刷豈遑多讓？筆者亦不妨設疑提問：宋代之印刷傳媒，是否助長日本京都學派所謂「唐宋變革」？是否為「近世特徵」之促成者？唐宋詩之所以異同，雕版印刷是否為其中之催化劑？詩分唐宋、宋詩特色之形成，印刷傳媒是否即其中之關鍵觸媒？推而至於討論宋代文學門類之多元，甚至詩話筆記之流行，或許多與雕版印刷繁榮於宋代，「天下未有一路不刻書」關係密切。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研究中國歷史分期，撰有〈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提出「唐宋變革」說，指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質上有顯著差異」，表現在政治、經濟以及學術、文學、繪畫、音樂等狹義文化方面尤其此疆彼界，壁壘分明。²⁵宮崎市定為內藤之弟子，學術專攻宋代；內藤強調唐宋在文化上的分野，宮崎則進一步闡釋宋代所具備的「近世」特徵。師生分進合擊，於是「唐代是中世的結束，宋代是近世的開端」，「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形成京都學派經典式之文化主張。這種變革，造成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根本的改變」，近乎革命性的重大轉變。論者曾列舉唐宋變革之面向，分政治、選舉任官、黨爭性質、人民地位、土地處分、貨幣經濟、工藝美術、學術文藝、交通資訊、科技發明、知識普及、兵制、法律等等，要皆可見唐宋變革之現象，宋代具備近世之特徵。²⁶至於何種觸媒造成「唐宋變革」？何種機緣促進「宋代近世」？京都學派或闕而弗論，或語焉不詳，不無遺憾。

鄧廣銘先生探究趙宋王朝的「右文」政策，以為具體落實在科舉考試與刻版印書上；因此，宋代文化才能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²⁷鄧先生討論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涉及雕版印書事業「由創始而漸流行」，「使得書籍的流通量得以增廣擴大」，已觸及問題焦點，可惜只順帶略提，並未作專題申說。筆者著有《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一書，²⁸從印刷文化史之視角切入，強調雕版印刷作為圖書傳播之媒介，與傳統寫本競奇爭輝。印本圖書挾其傳播優勢，對於兩宋士人之閱讀、接受、創作、論述，必然生發若干激盪。欲據此詮釋宋詩特色、唐宋詩異同、唐宋詩之爭、詩分唐宋，乃至於唐宋變革、宋代近世諸課題。推而廣之，或許可以解讀宋代經學之復興、史學之繁榮、理學之昌盛、

²⁴ 張秀民：〈宋代：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中國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10），上冊，第一章第三節，頁99-100。

²⁵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初刊於《歷史與地理》第九卷第5號（唐宋時代研究號，1922.5），頁1-12。後輯入《內藤湖南全集》第八卷，〈東洋文化史研究〉，1969，頁111-119。黃約瑟譯文，見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第一卷〈通論〉，頁10-18。

²⁶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2），頁5-71；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1期（總八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頁125-171。

²⁷ 鄧廣銘：〈宋代文化的高度發展與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論稿》序引〉，《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6），頁66-71。

²⁸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臺北：里仁書局，2008.03），頁1-631。

文學之新變，其關鍵視角，亦在雕版印刷作為圖書傳播之媒介上。

就宋代而言，標榜右文崇儒，雕版印刷對於科學考試、書院講學、教育普及、學風思潮、創作方式、評述法度、審美情趣、文風士習，生發何種效應？就歷史分期而言，內藤湖南、宮崎市定提出「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雕版印刷是否為其中之催化劑？是否如谷登堡發明活字印刷一般，形成「變革的推手」？就文化類型而言，王國維稱美天水一朝之文化，「前之漢唐，後之元明，皆所不逮」；「近世學術，多發端於宋人」；陳寅恪亦有「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說；²⁹傅樂成則提出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之分野，³⁰文化演變之不同，印刷傳媒居於何種地位？就詩歌而言，繆鉞《詩詞散論》標榜「唐宋詩異同」，³¹錢鍾書《談藝錄》強調「詩分唐宋」，³²雕版印刷是否即是其中之關鍵觸媒？谷登堡活字版流行，印刷傳媒在西方之繁榮發達，促成宗教革命、文藝復興，號稱「變革的推手」；在宋代，印刷傳媒與寫本、藏本競奇爭輝，是否亦生發類似之傳媒效應？

筆者翻檢《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宋會要輯稿》，以及宋人之詩話、筆記、文集、序跋，善本目錄、牌記，或語焉不詳，或文獻無徵。今欲考求宋代印本崛起，與寫本競奇爭輝，究竟生發何種傳媒效應？對詩話筆記之編印刊行有何影響？對於詩歌創作、詩學評論，是否有所制約或導向？不妨參考谷登堡發明活字印刷，促成宗教革命、文藝復興，曾經生發種種傳媒效應，多可作為類比借鏡。

（二）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變革之推手

知識傳播之媒介，從甲骨文金文，一變而為竹簡縑帛，再變而為紙張抄寫，已形成極大之飛躍。不過，抄寫謄錄，曠日廢時，其事甚艱，其功難成，其書易毀，費用昂貴，收藏不便。為愛日省力，利用厚生，於是知識傳播之媒介四變而成雕版印刷。西方稱美印刷術，許為「變革之推手」；流傳於東土之雕版刻書，自不遑多讓。蘇軾曾理性預言印本圖書之傳媒效應，唐宋文化之分野，已呼之欲出：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

²⁹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靜安文集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3），頁70；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臺北：里仁書局，1982），頁245-246。關於唐宋轉型，可再參考王水照：〈文史斷想·重提「內藤命題」〉，《鱗爪文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3），卷三，頁173-178。

³⁰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原載《國立編譯館館刊》一卷四期（1972.12）；後輯入《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9），頁339-382。

³¹ 繆鉞：〈論宋詩〉，《詩詞散論》（臺北：開明書店，1977）。

³²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11），一、「詩分唐宋」，頁1-5。

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蘇軾文集》卷十一，〈李氏山房藏書記〉）

五代馮道（882-954）刊刻《九經》以前，知識傳播均仰賴抄錄謄寫。傳抄艱難，圖書複製不易，影響流通之效率。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所謂「欲求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惟恐不及」，堪稱實錄。迨宋初雕版印書盛行，「日傳萬紙」，於是「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東坡乃預告：「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印本圖書之傳媒效益與影響，當十百倍於寫本，此可以斷言。宋型文化之知性理性，東坡已作若干指點。雕版印刷之傳媒效應，明胡應麟曾作精要提示，如云：

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也。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邇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素為不厚幸也。（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

明胡應麟較論竹簡漆文、楮墨鈔錄之傳媒，初以為後來居上，其功「數倍前矣」！至唐末宋初以來，「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印刷傳媒之為知識革命，變革推手，由此益信。印本相較於寫本，乃至竹簡帛書，其傳播效益，「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良非虛言！

1、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與傳媒效應

試對照中古歐洲，在活字版印刷使用前後，複製《聖經》工時之快慢懸殊，從而可以想見印刷術為「變革推手」之所以然。活字印刷生發之傳媒效應，由此不難推知：

印刷機使歐洲可以更為廣泛地獲得書籍。從前，書籍是由手工再造出來的，而一個「抄寫者」（通常是一個修道士）一年只能完成兩本書。因此，書籍稀少，而且非常珍貴，經常用鏈條扣在閱讀台上。相比之下，一個使用谷登堡印刷機的印刷工人，一天就能生產一本書。所以，文藝復興是以一個使知識的獲得大大便利

起來的發明開始啟動的。³³

《聖經》等書籍之獲得，抄寫「一年只能完成兩本書」；若使用谷登堡印刷機，則「一天就能生產一本書」。快速而便利獲得知識，這是印刷術對圖書傳播的革命性貢獻。谷登堡發明活字印刷術，促成中古歐洲的宗教革命，文藝復興，民族文字與文學建立，科學文化突飛猛進。錢存訓曾稱：印刷術的發明和使用，「還普及了教育，提高了閱讀能力，和增加了社會流動的機會。總之，幾乎現代文明的每一進展，都或多或少地與印刷術的應用和傳播發生關聯。」³⁴因此，印刷術在西方，被稱為「神聖的藝術」、「文明之母」，以及「變革的推手」。³⁵雕版印刷在東土，傳媒效應理應異曲同工。由於宋元之際傳世文獻載錄「看詳禁毀」之負面效應極夥，³⁶正向推崇印刷傳媒，提供印刷文化史文獻者，卻一鱗半爪，徵存不豐。蓋習焉不察，民生日用而不覺。無已，只得採行類比推理方式，以谷登堡活字版印刷術在中古歐洲生發之種種變革，類比東土宋朝雕版印刷之傳媒效應。

印刷術流行，引發種種連鎖變革，基本影響為書價的降低和書籍的相對平凡化。另外，還影響到閱讀實踐的改變，加強了一種古老的變革，諸如「不同的稿本不再被採用，著作法規也在逐漸改變，文學領域進行重新組織（有關作者、文本和讀者）」。³⁷印刷的發展和通俗化，亦改變了閱讀的環境。法國年鑑學派大師費夫賀（Lucien Febvre）與印刷史學者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印刷書的誕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強調：「印刷帶動文本的大規模普及」；「這顯然是種變遷，且變的腳步還頗快」，同時提出印刷書促成文化變遷結果之種種推測：

大眾究竟需要書商與印刷商提供他們哪類書刊？印刷究竟令傳統的中世紀文本，普遍到何種程度？這些舊時代的傳承物，又被印刷術保存住多少？印刷機驟然突破了既有的智識作品保存媒介，是否也助長了新的文類？或者情況正好相反，是早期的印刷機大量印刷了許多傳統的中世紀書籍，才讓這些作品的壽命意外地延長數十年，一如米什萊所言？我們將試著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³⁷

³³ （美）E·M·羅杰斯（Rogers, E.M.）著，殷曉蓉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7），第一部份〈傳播學的歐洲起源·文藝復興（1450-1600）〉，頁30-31。

³⁴ 錢存訓：〈印刷術對西方文明的衝擊〉，同註20，第十章（二），頁349。

³⁵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頁3、頁7。

³⁶ 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同註22，頁206-209。

³⁷ 費夫賀（Lucien Febvre）、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著，李鴻志譯：〈印刷書：變革的推手〉，《印刷書的誕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第八章，一、從手抄本到印刷書，頁248-249。

費夫賀、馬爾坦所著《印刷書的誕生》，第八章為〈印刷書：變革的推手〉，論述印刷術的神奇效應，除宗教改革外，與人文、語言、藝術相關之論述，如：「印刷的主要任務，在於傳播純正的古代經典。而且，以書本復興了人文思維，風行而草偃。」；「經典文本的真知灼見，可以透過印刷，正確無誤地傳布、倡導。」云云。³⁸

谷登堡活字印刷的主要任務之一，為傳播純正的古代經典。五代馮道，首倡雕版刊印《九經》，³⁹北宋國子監刊刻《五經正義》、《七經義疏》，以及刊行監本《十七史》，落實崇儒右文之政策。宋初以來，前代或當代之文集詩集，多由專家學者整理、校讎、編選、刊刻，尤其宋人為學古變古，學唐變唐，而整理編選唐人詩文集，徵存文獻，其功足多。⁴⁰印刷術作為知識傳媒，影響力是龐大的；生發的效應是驚人的。東西方當權者不約而同，對於異端邪說，採行嚴懲嚇阻。宋代朝廷對雕版印刷之監控，輕則看詳，重則除毀。⁴¹畢竟，印刷書有化身千萬之可觀數量，有無遠弗屆之流通領域，又有迅速便捷之傳播效率，以及對世道人心、學風士習之深廣影響，故東西方當道者為思患預防，鮮少留情如此。那一方面的中古歐洲抄本，能贏取出版商青睞？這牽涉到書籍作為商品，首要目的就是營利。如何吸引讀者？保有利潤？當是基本考量。東方的雕版和西方的活字，也有共通的傾向，如：「印刷機大量複製書籍，促成書本數量的提升，更令選書變得嚴格。」「這些古代文豪的經典作品，無論原典翻譯、改寫本，付梓不少，版本繁多。」⁴²

宋人之學習接受唐詩，曾先後宗法白居易、李商隱、杜甫、韓愈、晚唐詩人，宋人整理雕版唐人詩文集，宋人之取決於審品味，綜觀而論，多與雕印圖書趨向一致。⁴³西方活字出版，選書嚴格，大凡一流文體、文豪經典、廣獲爭讀者、廣受歡迎者、能帶來利潤者，多能得印刷商喜愛。商品經濟，供需相求，東西方之印刷商並無不同：「印刷肇始之初，成千上萬的中世紀手抄本，既不可能全部印製成書，書商基於暢銷和獲利考量，當時最多人感興趣的著作，往往列入優先考慮。」「判定哪些作品值得一印，牽涉到孰存、孰廢的選擇，

³⁸ 同前註，頁 137、138-140。

³⁹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宋〕王溥：《五代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卷八〈經籍〉，頁 128-129。蜀毋昭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宋〕司馬光主纂：《資治通鑑》（臺北：世界書局，1986），卷二九一〈後周紀二〉，頁 9495；《冊府元歸》卷六〇八、《文獻通考》卷十七，文字略有出入。〔清〕葉德輝：《書林清話》（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9），卷一〈書有刻板之始〉，頁 21-23。

⁴⁰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同註 28，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頁 145-324。

⁴¹ 同前註，第二章第三節〈朝廷對書坊雕印圖書之監控與禁毀〉，頁 51-76。

⁴² 費夫賀等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同註 37，頁 249、256。

⁴³ 張高評：〈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漢學研究》第二十四卷第二期（2006.12），頁 191-223。

起初確是由 15 世紀的人憑藉當代的品味，與輕重緩急拍板定案。」⁴⁴

「大宗消費與標準化之現代社會」，注重供需相求，蔚為商品經濟，作品論著是否交付印刷，自然是憑藉當代之審美品味，與輕重緩急之抉擇。所謂圖書出版的取捨、最多人感興趣的著作，以及提供閱讀與模仿的版本等等，多跟宋代雕版印刷選本之取捨相近相似，一以「品味」為依歸。⁴⁵《印刷術的誕生》一書提出數據，「16 世紀出產的印刷書，足以讓所有識字的人，都有機會讀到書」，「讀書的門檻則愈來愈低」，印刷圖書的便捷流傳，對於教育普及，深具意義，無論東西方，無論雕版或活字，《印刷書的誕生》一書述說極具體明確。

法國弗雷德里克·巴比耶《書籍的歷史》，亦論述谷登堡發明印刷術之效益；E·M·羅杰斯《傳播學史》更提出有力數據，說明活字印刷術促使社會變化、啟動文藝復興，如：「多虧了這印刷術……圖書就被快速、準確、精美地印刷出來了。」「1500 到 1510 年間，印刷書取代了圖書館裡的手抄本，使之屈居其下。」⁴⁶「印刷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變化，所以它在歐洲的發明，就成為文藝復興開始的日子。」云云。⁴⁷

2、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與創新詮釋

唐人文集流傳至今，多經宋人搜集、整理、編纂、刊印；⁴⁸而宋人之古籍整理，多為學習、閱讀、宗法、評鑑而發。宋代之經學復興、史學繁榮、理學昌盛、文學獨到，是否與圖書傳播便捷，尤其是印本的傳媒效應有關？谷登堡發明活字印刷術之前，複製圖書全賴手工。一位修道士必須花費半年，才能抄寫完成一本書。印刷術發明之後，一位印刷工人一天就能印製完成一本書。就速度效率而言，是 182：1，這是何等懸殊的比重？料想東方宋朝之雕版印刷，所造成之圖書刊行質量，亦相近不遠。試看活字印刷之傳媒效應，一則在恢復文本的原貌，再則在擺脫前賢之解釋評注，三則對古代學說進行重新詮釋，甚至增添補述。反觀宋代之疑傳改經，⁴⁹宋學之創造自得，開發遺妍，⁵⁰多與中古歐洲異曲同工。

⁴⁴ 費夫賀等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同註 37，頁 261-262。

⁴⁵ 張高評：〈印刷傳媒與宋詩之學唐變革——博觀約取與宋刊唐詩選集〉，《成大中文學報》第十六期（2007.4），頁 24-41；〈印刷傳媒與宋詩之新變自得——兼論唐人別集之雕印與宋詩之典範追尋〉，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文與哲》第十期（2007.6），頁 249-261。

⁴⁶ （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著，劉陽等譯：《書籍的歷史》（*Histoire du livre*）（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第五章〈谷登堡和印刷術的發明〉引紀堯姆·費謝，頁 96、263-264。

⁴⁷ E·M·羅杰斯：〈傳播學的歐洲起源·文藝復興（1450-1600）〉，《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同註 33，第一部份，頁 31。

⁴⁸ 周勛初：〈宋人發揚前代文化的功績〉，北京大學、四川大學主編《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10），頁 59-63。

⁴⁹ 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80.6）；楊新勛：《宋代疑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3）。

⁵⁰ 陳植鏗：《北宋文化史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3），第三章第四節〈宋學精神〉，頁 303-314。

尤其是「既有的學術傳統分流而並立」；雕版印刷對唐宋變革、唐宋詩異同，詩分唐宋、宋型文化與唐型文化，以及宋學與漢學之分途，是否亦有關聯，其中受印本圖書影響之情況如何？是否如活字版一般？此一課題，值得論證。又如：

人文主義所關心的，在於挽救並恢復古典理論文本的原貌，修編後重新發行，徹底擺脫中世紀編輯者遺留下來的解釋與評注。（費夫賀《印刷書的誕生》，頁 278）

科學圖書之印刷出版，古典科學家的學說與教誨，總算有機會接受重新詮釋、評注，甚至增添補述。於是奠基於古籍舊典的智識傳統就此蓬勃，與既有的學術傳統分流而並立。（同上，頁 279）

由於雕版印刷之便捷，有「易成、難毀、節費、變藏」諸優長，化身千萬，無遠弗屆，於是促成士人「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對於治學作文，有本有源，提供許多方便，蔚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之盛況；試與活字印刷相較，亦殊途而同歸：「印刷書問世，發行量大幅提升，讓中世紀廣泛使用的文本，更加唾手可得，替希臘羅馬古文學的鑽研預先鋪路。」「古代文本歷經中世紀的缺漏、訛傳之後，經過人文學者的重新發掘、校正、補遺，而廣泛流傳。」（費夫賀《印刷書的誕生》，頁 254）這些，都是活字印刷書產生的影響，值得參考借鏡。

以宋代之經學復興而言，仁宗慶曆是一大分水嶺；學術風尚，仁宗慶曆朝亦一大分野，宋人筆記，近人論述，多已隱約指陳，如：

慶曆以前，多尊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為《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荊公修《經義》，蓋本於原甫。⁵¹

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⁵²

大歷以還之新學，雖枝葉扶疏，而實未能一掃唐之舊派而代之。歷五代至宋，風俗未能驟變也。舊者息而新者盛，則在慶曆時代，然後朝野皆新學之流。⁵³

⁵¹ [宋] 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卷二，〈注疏之學〉，頁 28。

⁵² [宋]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說〉，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54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頁 324。

⁵³ 蒙文通：〈《五代史》、《唐書》之重修與新舊史學〉，《經史抉原·中國史學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

吳、陸二家之說，論唐宋經學之嬗變，以宋仁宗慶曆為分水嶺。促成嬗變之因緣觸媒，是否即是宋初以來之右文政策、科舉考試、圖書流通、印本文化？值得進一步推究。至於蒙文通觀察到「舊者息而新者盛」的盛衰消長風氣，亦殊途同歸，異口同聲坐實慶曆時代。斯時，新學、洛學、蜀學蔚起，競勝爭輝。朝廷崇儒右文，開科取士，官家雕版圖書，興教濟眾；家刻坊刻期許布之四方，圖永其傳。⁵⁴圖書信息量如此充沛多元，其生發之傳媒效應應當如之何？谷登堡活字印刷術之發明推廣，除易於恢復古典原貌，取代過時版本外，以印本替換寫本，重新發行，容易進行增補論述，發揮新詮釋、新評注。反觀宋代，經典解釋權從官方的孔穎達，下放到士人或學者手中。於是雕版印刷之崛起，圖書流通之便捷，促成學術傳統的分流與並立。學者士人既擁有經典解釋權，於是各自表述，遂蔚為宋代經學之復興與史學之繁榮。

活字印刷的貢獻，在古籍經過整理，得以廣泛流傳，而且由於發行量大，故閱讀文本，唾手可得。印刷術成為「變革之推手」，主要在它的無所不在，化身千萬，此與雕版印刷之傳媒功能無異。活字印刷既便於傳播信仰，更利於傳播訊息，於是促成宗教革命，有功語言定型，此不在話下：

印刷術的傳播功能，在於複製圖書，印量龐大可觀，便利傳播知識，亦便於傳播信仰，更便於印製數以千計的傳單、海報，傳播訊息尤其得心應手，所以能助長宗教改革的茁壯。（費夫賀《印刷書的誕生》，頁 294-325）

由於印刷業的緣故，《聖經》越來越容易獲得，因而這一宗教（羅馬天主教）也受到了威脅。天主教牧師不再是《聖經》的唯一解釋者；修道院失去了對書籍再生產過程的控制，而天主教教會也因為印刷業而喪失了權力。……新教徒對於天主教教會的反抗就得助於印刷機，得助於資本主義的興起。⁵⁵

印刷術之崛起，從此《聖經》獲得容易，於是《聖經》的解釋者，不再只有天主教教士，教會複製《聖經》的壟斷權也被打破；新教徒對於天主教教會的反抗，有了活字印刷術之幫助，更加如雪上加霜，變本加厲。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生發之效應，對於雕版印刷在宋代，有何啟示？在唐代，官修《五經正義》，統一學術，猶中古歐洲操控《聖經》解釋權；中唐以後，方鎮割據，威權解體，啖助、趙匡新《春秋》學派獲得經典解釋權。至宋代，

頁 308。

⁵⁴ 張高評：〈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同註 22。

⁵⁵ E·M·羅杰斯著、殷曉蓉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同註 33，頁 32。

雖有國子監本《九經》、《十七史》，然家塾本、書坊本亦可雕印經、史。士人爲參加科舉，每多自由參閱取讀，不主一家一本。雕版印刷繁榮，生發此種態勢，是否影響宋代之經學復興、史學繁榮、理學昌盛、文學新變？無一不值得探討。

宋代號稱「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盡心致力推廣印本，於是因時乘勢，雕版印刷與古籍整理、圖書流通、知識傳播結合，供需相求，遂形成「印本文化」之繁榮昌盛。論者稱：雕版印刷在宋代之崛起與繁榮，產生了雙重之社會效果：其一，印本作爲物質商品，於社會上產生重要之經濟效果；其二，印本作爲精神產品，對文化教育生發積極之促進作用。⁵⁶南北兩宋三百年間，「刻書之多，地域之廣，規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寬，都堪稱前所未有，後世楷模」。⁵⁷除傳統之寫本、藏本外，印本蔚然成爲圖書傳播之新寵。印刷書的普及，佐以傳統寫本之流通，圖書信息量之豐沛，作品之閱讀與接受，形成二大傾向：一則爲學古通變，提供模仿欣賞；再則爲自成一家，提供出入參悟，典範借鏡。就魏慶之《詩人玉屑》一書觀之，宋人蓋盡心乎意新語工，致力於自得意到，而以自成一家相期許。唐宋詩所以異同，詩所以分唐宋，此中自有消息。

自日本京都學派提出「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於是東瀛、西洋、中國、臺灣學界持此觀點論學者極夥。除王國維、陳寅恪、錢穆、繆鉞、傅樂成、錢鍾書外，就文學、美學、思想、經術、文化而言，近十年來相關論著不少。⁵⁸或標榜轉型，或強調變革，或考察演變，或揭示建構；究竟是何種機緣促成唐宋之變革？又是何種媒介造就此種轉型？學界所著專書，或直探傳媒效應之於宋詩，或略述雕版印刷出版繁榮，影響宋代文學創作、傳播、閱讀；⁵⁹其餘皆只陳述現象，均未探索原委，不無遺憾。「媒介即信息」(the media is the message)，此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之提倡。⁶⁰本文擬借鏡傳播與接受之理論，以探討宋代詩話、筆記在寫本、印本雙重傳媒下，究竟生發何種信息？《詩人玉屑》輯述諸家詩學，是否有如實之體現與反饋？

⁵⁶ 李瑞良：〈圖書流通的社會效果〉，《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第五章第四節，頁308-321。

⁵⁷ 張秀民：〈宋代（960-1279）：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中國印刷史》，頁040-161；李致忠：〈宋代的版印概況〉，《古代版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11），第五章，頁87-128。

⁵⁸ 林繼中：《文化建構文學史綱：魏晉——北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4）。包弼德（Peter K. Bol）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同註23，頁158-160。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9）。曾祥波：《從唐音到宋調——以北宋前期詩歌為中心》（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3）。劉方：《唐宋變革與宋代審美文化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4）。葛景春：《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8）。田耕宇：《中唐至北宋文學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7）。吳國武：《經術與性理——北宋儒學轉型考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3）。

⁵⁹ 劉方：〈印刷出版繁榮對於宋代文學創作、傳播、閱讀等方面的影響〉，同前註，第四章第三節，頁253-267。

⁶⁰ 黃曉鍾、楊效宏、馮鋼主編：〈人物·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傳播學關鍵術語解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8），頁287-289。

三、《詩人玉屑》引書與接受反應

試參考接受美學的理論，考察《詩人玉屑》對宋代詩話之接受。接受活動的組成要素有三：即接受主體、接受對象，以及接受關係。其中，主體魏慶之為編纂兩宋詩話之發動者，對象為宋代之詩話筆記、文集、語錄，乃主體指向的目標；而由主體與客體對象互動，斟酌取捨之際，形成的聯結紐帶，便是《詩人玉屑》對諸家詩話斟酌損益，取舍予奪的接受關係。

（一）《詩人玉屑》與兩宋詩學之反饋

《詩人玉屑》之編纂，魏慶之作為原始讀者，必然泛覽博觀，出入眾作，始能梳理詩話優劣，擇精取要，度人以金針。《詩人玉屑》纂輯諸家作為一個接受者（信宿），諸家詩話筆記作為傳播者（信源），北宋以來詩話、筆記等詩學之信息，隱約已作回授與體現。就信息傳播而言，諸家詩學在獲選移錄為《詩人玉屑》之際，信息已被強化或分享。⁶¹易言之，信宿與信源因果循環之效應，已造就了《詩人玉屑》強調詩法、詩格，提倡詩藝、詩思之內容。由此觀之，《詩人玉屑》雖纂輯諸家詩話、筆記、文集、語錄以成書，何異於自著一書？此之謂「述者即是作者」。

就文學傳播之研究而言，大抵涉及六個層面：一、傳播主體；二、傳播環境；三、傳播方式；四、傳播內容；五、傳播對象；六、傳播效果。⁶²宋初以來之詩話筆記，傳播主體或為個體作者，或為詩社詩派群體，又有官方、書院、書坊等傳媒，不一而足。置身右文崇儒，讀書博學、文化轉型、學唐變唐，追求自得自到，自成一家之環境氛圍中，傳播方式除傳統之寫本（稿本、抄本、藏本）外，又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之印本圖書，相濟為用，交相映發。至於傳播內容，多為宋代詩學之主潮，諸如因襲點化、推陳出新、創意造語、規矩自由、死法活法、詩病詩法等之體現。詩話傳播之對象，誠如《白石道人詩說》所言：初則為「不能詩者」，終則亦為「能詩者」而作。換言之，天下詩人與士人，欲得靈方妙法，欲求換骨而僊者，多是詩話傳播之接受者。至於傳播之效果，提示格律、鑒材、斧藻、法度等等，可因而準式、研覈、品味、據依，依麥克盧漢「媒介即信息」之說，體現於《詩人玉屑》及南宋詩歌詩論中者多，已蔚為宋代詩學之反饋與回授。⁶³

⁶¹ E·M·羅杰斯著，殷曉蓉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同註33，第十一章〈克勞德·香農的信息論〉，頁365-369、386-389。

⁶² 王兆鵬：〈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的六個層面〉，王兆鵬、尚永亮主編：《文學傳播與接受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6.4），頁1-12。

⁶³ 「反饋」，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傳播流通，被傳遞的信息，描繪了系統自身在從前某一時間的運行狀況。

今核計《詩人玉屑》之徵引諸書，標榜詩法詩藝，強調藝術技巧，約可考見魏慶之著書旨趣，誠如郭紹虞所言。徵引數量較多者，以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居冠，高達 85 條以上；其次，則王立之《王直方詩話》44 則、范季隨《陵陽室中語》33 則、許顗《許彥周詩話》30 則、蘇軾之文集筆記 28 則、吳曾《復齋漫錄》28 則、黃昇《玉林詩話》27 則、蔡條《西清詩話》26 則、葉夢得《石林詩話》25 則、惠洪《冷齋夜話》25 則、《分甘餘話》24 則、魏泰《臨漢隱居詩話》21 則。又其次，《漫叟詩話》19 則、黃徹《碧溪詩話》19 則、呂本中《童蒙訓》19 則、《蔡寬夫詩話》18 則、范溫《潛溪詩眼》17 則、鍾嶸《詩品》亦 17 則、《後山詩話》15 則。《詩人玉屑》卷一、卷二，幾乎全錄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詩法〉、〈詩評〉、〈詩體〉，楊萬里《誠齋詩話》，以及姜夔《白石道人詩說》29 則。由此觀之，《詩人玉屑》之所採摭，絕大部分皆為宗法江西詩法之文獻。外此，則葉夢得《石林詩話》、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嚴羽《滄浪詩話》作為南宋詩學之反響，所論猶滄浪〈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所云：「間說江西詩病，真取心肝劖子手。」彼此觀照，詩學旋向與主潮乃出。其中可怪者，為《詩人玉屑》並未徵引張戒（？-1124-1160？）《歲寒堂詩話》一言半語。且南宋至元代之詩話、筆記、目錄，均未隻字提及或稱引。或者，《歲寒堂詩話》嚴詞批判蘇軾、黃庭堅、江西詩法，悖離南宋初年之文風詩潮，不合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市場機制，導致無緣雕刻出版，以致影響流通傳播？⁶⁴確實原因如何？待考。

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盧漢認為：一切媒介，都是人類感官的延伸；以為：使用不同的傳播技術，會影響人類感覺的組織。進而提出：傳播媒介中的變革本身，就會給人類社會帶來某種訊息，引起社會的某種變革。因此，媒介不僅是承載內容的形式，對信息、知識、內容也有積極能動的反作用，此即所謂「媒介即信息」之說。⁶⁵宋代詩話之流通傳播，由寫本而印本，「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明胡應麟《少室山房隨筆》體認這種改變所生發之傳媒效應，較諸竹簡漆書「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蘇軾於北宋元祐間，〈李氏山房藏書記〉亦震撼於「轉相摹刻，日傳萬紙」之印本圖書，推測「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詩話之傳播，由稿本寫本轉化為雕版印本，傳播媒介與技術業經變革，則由此而生發之信息、知識、內容等，亦當有所承載與反饋，此不難斷言。

（二）《詩人玉屑》徵引諸家與宋詩宋調之集成

E·M·羅杰斯著，殷曉蓉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同註 33，第十章〈諾伯特·維納和控制論〉稱：「一個系統自身的行為結果，提供了新的信息；系統就憑藉這個新的信息，修正它自己隨後的行為。」頁 350-358。

⁶⁴ 《歲寒堂詩話》現今未見宋本、元本，較早者為明本。陳應鸞：《歲寒堂詩話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0.3），〈前言〉，頁 10-14。

⁶⁵ 黃曉鐘、楊效宏、馮鋼主編：〈人物·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同註 60，頁 288-289。

詩話之編著，初始以稿本寫本流傳，其後因應學風詩潮與商品經濟，乃有雕版圖書之刊印傳播。西方學者研究谷登堡活字印刷，注意印刷商鍾情的作品和論著有兩大原則：其一，憑藉當代的品味，與輕重緩急拍板定案；其二，基於暢銷和獲利考量，當時最多人感興趣的著作，往往列入優先考慮。⁶⁶宋初以來諸家詩話之圖書流通，除傳統之寫本（抄本）外，絕大多數為「易成、難毀、節費、便藏」之雕版印刷圖書，其傳媒效應正可與中古歐洲谷登堡發明活字版，運用於圖書出版相對應。今考察《詩人玉屑》徵引諸家詩話，數量在 25 則以上者，約十二種。分別論述如下：

1、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詩人玉屑》引述北宋以來諸家詩話，以數量而言，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位居徵引之冠，高達 85 條以上。一方面，宋初以來詩話、詩論、隨筆、文集，備見此編；再方面，又搜羅元祐以來蘇黃諸公詩話、史傳、小說，取其可以「發明詩句，增益見聞者」。據此，則北宋一代詩學文獻之淵藪，《叢話》當為首選。其三，以版本學而言，紹熙甲寅（光宗紹熙五年，1194 年），《苕溪漁隱叢話》前後集一百卷，陳奉議早已刊刻於萬卷堂。⁶⁷胡仔《叢話》前集〈自序〉稱：觀覽此書，「則古今詩話，不待檢尋，已燦然畢陳於前」，從其自許，可以想見其書之規模。其《後集·自序》稱：「余嘗謂開元之李杜，元祐之蘇黃，皆集詩之大成者。」其書於此四公多所品藻，正所以體現元祐以來詩壇流風所向；四公之中，對於杜甫、蘇軾、黃庭堅三家尤多著墨，則胡仔唐宋詩之宗派取向可知。南宋宗師杜甫，取法蘇、黃，尤其是尊崇黃庭堅及江西之詩風，《苕溪漁隱叢話》堪稱孤明先發者。尤其難能可貴者，胡仔採編詩話之餘，特出「苕溪漁隱曰」云云，作為考證評鑑之特識，態度謹嚴，卓見良多，當時已有《苕溪詩話》、《漁隱詩話》之目，蓋自《叢話》輯出別行者。《叢話》之編著，身當元祐學術解禁之後，江西詩法天下風從之前，因緣際會，得時而行，鈔本刻本之版本流傳，必定多元而興盛。就傳播與接受，「媒介即信息」而言，《苕溪漁隱叢話》集北宋詩話之大成，宋初以來詩學之學古通變，典範選擇已具體而微表述之，信息之反饋情形，亦呼之欲出。除上述紹熙甲寅刻本外，流傳於世者，今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各藏有殘宋本，一殘存《前集》，一殘存《後集》，不相混雜，皆為宋本。今通行本為清乾隆五年（1740）楊佑啓耘經樓依宋版重雕本。⁶⁸遙想當年，《苕溪漁隱叢話》既為闡揚宋詩宋調之孤明先發者，故至南宋風會所趨，傳播廣遠，至南宋理宗淳祐甲辰（1244）《詩人玉屑》雕

⁶⁶ 費夫賀等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同註 37，頁 261-262。

⁶⁷ 郭紹虞：《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79），上卷，「苕溪漁隱叢話」，頁 81。

⁶⁸ 張高評：〈宋刊詩話總集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學報》第 45 期（2009.6），（四）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一百卷，頁 201-234。

版刊行，乃得以沾溉反饋，而體現為廣徵博引，高達近 90 條。

2、王立之《王直方詩話》

王立之（1069-1109）《王直方詩話》六卷，《詩人玉屑》徵引 44 則，數量居次。據考證，其書殆作於晚年退居城南時，約在崇寧大觀之間（1103-1109）。⁶⁹書名或作《歸叟詩話》、《王立之詩話》、《詩文發源》、《蘭臺詩話》。書名不一而多樣，就信息之反饋而言，可以想見其傳播之廣，且受容之眾。除《詩人玉屑》外，《王直方詩話》廣為南宋以來詩話筆記所接受，《詩話總龜》徵引最多，高達 203 條；其次《苕溪漁隱叢話》109 條，《詩林廣記》31 條、《竹莊詩話》24 條、《能改齋漫錄》17 條，⁷⁰其流布之廣遠可以想見。《郡齋讀書志》稱：「宣和末，京師書肆刻印鬻之」，是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是書已有印本傳播。⁷¹書肆刻印圖書，首先考量供需相求之機緣，《王直方詩話》之雕版印售，符合商品經濟之期待，亦暗合當時學風思潮之流向。其書記述事實，雖每多疏闊失實，然評詩論藝，不無識見，所謂「紀事之疏，無妨於意見之是也」。⁷²王直方平居，與蘇軾、黃庭堅、陳師道、呂本中、張耒、秦觀等相善，結為詩友。呂本中撰《江西詩社宗派圖》，曾列王直方於其中，固是江西社裏人也。其評詩亦本諸江西詩派，推尊杜甫、蘇軾、黃庭堅、陳師道，追求自成一家，注重詩興自然，揭示詩藝詩法，自是宋詩宋調之提倡與推手，然又不拘守於格法者。詩學主張與南宋主流詩潮合拍，故贏得諸家詩話之接受與稱引。

3、范季隨《陵陽室中語》

《陵陽室中語》為范季隨所錄韓駒（？-1135）論詩之文獻。原書久佚，散見於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徵引 23 則）、《詩人玉屑》（徵引 33 則），以及元陶宗儀《說郛》（百卷本存 9 則，宛委山堂本存 2 則，各不同）。大抵未曾刊刻，故散佚容易。《江西詩社宗派圖》列韓駒於其中，雖不苟同，然其論詩於立意、取材、積學、用事、修改方面，多與江西詩派主張相近。為詩尊崇陶淵明、杜甫等，實即宋詩典範，宋調代表，可見其詩學取向。許顥《許彥周詩話》據《百川學海》本〈自序〉，謂成書當於南宋初高宗建炎二年（1128）。當時詩

⁶⁹ 李裕民：《宋詩話叢考》，《宋史新探》（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1），十三「王直方詩話」。據郭紹虞《宋詩話輯佚》本第 86 條，考證《王直方詩話》作於崇寧二年至大觀三年間。頁 351。或云：《詩話》載「陳無己詩識」，陳師道卒於徽宗崇寧元年（1102），故《詩話》之作，當在王直方晚年（1102-1109）之間。

⁷⁰ 羅根澤：〈附錄·兩宋詩話輯校敘錄〉，《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六、「王直方詩話」，頁 927。

⁷¹ 郭紹虞：《宋詩話考》中卷之上，「王直方詩話」，頁 129。

⁷² 羅根澤：《兩宋文學批評史》，同註 70，頁 927-928。

壇名家如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多曾有文字交。《許彥周詩話》論詩，頗致力於煉字、煉句、煉意、用典，宗旨雖根源於蘇軾、黃庭堅，然縱古觀今，持論亦多能出以己意，不隨人作計。⁷³

4、嚴羽《滄浪詩集》

魏慶之《詩人玉屑》刊行於理宗淳祐四年（1244），幾乎全部採錄嚴羽（1197-1241?）《滄浪詩話》全書，且置之篇首，「從魏氏抄錄的情形看來，段落字句都很明順，近乎原本」；⁷⁴足見此書於南宋晚年之流通，以及詩話之傳播與受容。嚴羽《滄浪詩話》之初始雕版，大抵在度宗咸淳年間（1265-1274），下距南宋滅亡不到十年，或者嚴羽未及見此書之刊行。傳世之最早刊本，為明正德十五年崑山刊本，《滄浪詩集》四卷附《詩話》一卷，有咸淳四年（1268）黃公紹序。《滄浪詩話》體系嚴謹完密，較論唐宋詩之優劣得失，批判南宋江西詩派（近代諸公）之流弊，揭示宋詩宋調之特色，提出別才別趣，興趣妙悟，熟參涵咏等審美意識之特殊規律，「宋人詩話以此書最享盛名，影響亦最大。」誠非虛言。

5、楊萬里《誠齋詩話》

楊萬里《誠齋詩話》，大抵成書於楊氏晚年，當在紹熙五年（1194）孝宗去世，嘉泰改元之後（1201-1204）。⁷⁵南渡詩人大抵自江西詩入，而不自江西出，誠齋亦然；詩話中多江西派緒論，以此。論者以為：《滄浪詩話》所舉「江西宗派體」與「楊誠齋體」，雖名稱有別，而歸趣則一，其間固有可通者矣！⁷⁶要之，楊萬里詩學理論既突破江西詩派之藩籬，然又未盡脫江西詩法之影響。《誠齋詩話》多附於《誠齋集》中，今日本宮內廳書陵部猶藏一部宋槧，為嘉定元年（1208）刊本；《詩人玉屑》刊本最早刊行於淳祐申辰（1244），所謂建陽黃昇刻本，卷首亦幾乎全錄《誠齋詩話》。可見《誠齋詩話》之江西詩法取向，已為《詩人玉屑》編著者所認同與接受。

6、姜夔《白石道人詩說》

姜夔《白石道人詩說》一卷，本附於《白石道人詩集》內，故《直齋書錄解題》、《宋

⁷³ 陳昌渠：〈許顗《許彥周詩話》〉，吳文治主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名著題解》（合肥：黃山書社，1987.2），頁146。

⁷⁴ 王夢鷗：〈嚴羽以禪喻詩試解〉，同註11，頁379。

⁷⁵ 辛更儒：《楊萬里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9），卷一一四，〈詩話〉箋證，頁4348。

⁷⁶ 郭紹虞：《宋詩話考》上卷，「誠齋詩話」，頁85-87。

史·藝文志》皆著錄於集部別集類中。據《白石道人詩說》原序，其書殆完成於淳熙丙午（1186）年左右。是書論詩，強調詩法與詩病；論悟、論活法，每與江西詩人有別。論者稱：《白石道人詩說》內容有十：立法度、樹妙境、尚自然、倡含蓄、崇意格、辨詩體、重精思、貴獨創、主情性、講涵養。⁷⁷在江西詩論披靡一世之後，《滄浪詩話》尚未流行之前，從《白石道人詩說》可窺詩論轉變之消息。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一，全錄此書，稱為《白石詩說》，可見傳播與接受之效應。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八推崇之，以為可與《滄浪詩話》、《歲寒堂詩話》鼎足而三，要皆論詩及辭之詩話經典代表。

7、蘇軾文集與筆記

蘇軾之文集與筆記，《詩人玉屑》徵引近 30 則。《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類著錄蘇軾《東坡詩話》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作二卷。除外，則《詩話總龜》、《愛日樓叢抄》、《草堂詩話》、《耆舊續聞》、《詩林廣記》多有徵引，蓋非東坡自著，乃好事者編纂而成。蘇軾才高名大，詩文落筆，「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烏臺詩案期間，御史臺指稱：「軾所為譏諷文字，傳於世者甚眾，今獨取鏤版而鬻於世者進呈」，可見蘇集已板行流傳海內。⁷⁸甚至流傳至契丹遼國。范陽書肆刊刻有《大蘇小集》，可見雕版印刷之無遠弗屆，流傳廣遠。蘇軾為北宋最有讀者魅力之文學家，無論生前或死後，詩文集經傳鈔，編輯刊刻者極多。南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八稱：「東坡文集行於世者，其名不一」；南宋刊本《重編東坡外集》，著錄傳世之蘇軾文集凡二十四種。至南宋，士人以「家有眉山之書」為榮。刊刻本又有《東坡七集》、《東坡別集》、《東坡外集》之目。要之，蘇軾文集流傳後世者，主要為《東坡七集》之版本系統。有關注釋蘇詩之刊本，宋代大抵有八種：趙夔類注本、吳興沈氏注本、漳州黃學皋補注本、宋刊五家注、宋刊五注與十注拼合本、舊題王十朋纂集《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本、施（元之）顧（禧）注《東坡先生詩》四十二卷本、廖瑩中注本。今傳世東坡詩注本凡三：一為集注本、二為類注本、三為編年注本。日本所藏宋刊本蘇軾詩文集，度藏於宮內廳書陵部、內閣文庫、金澤文庫者，尚有殘本兩種，⁷⁹可謂琳瑯滿目，洋洋大觀矣。衢本晁公武

⁷⁷ 賈文昭：〈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吳文治主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名著題解》，同註 73，頁 221-224。

⁷⁸ 朋九萬：《烏臺詩案》（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劄子）、《監察御史裏行舒亶劄子》，四川大學中文系主編：《蘇軾資料彙編》上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4），頁 580。內山精也：〈蘇軾の文學と印刷メディア—同時代文學と印刷メディアの邂逅—〉，《蘇軾詩研究：宋代士大夫詩人の構造》（東京都：研文出版 2010.10），頁 142-162。

⁷⁹ 曾棗莊：〈家有眉山之書—南宋蘇軾著述刊刻述略〉，《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3），第二章第二節頁 118-138。又，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九《東坡集》，頁 401-421；卷十，《注東坡先生詩》，頁 451-465；劉尚榮：《蘇軾著述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頁 1-131。嚴紹璽：《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鈎沈》（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12），頁 53-56。

《郡齋讀書志》卷十九稱蘇軾「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卷十五稱：「蘇詩衣被天下，刻本叢雜」；蘇詩之傳播方式，除刻本外，尚以刻石、稿本、題贈、傳鈔、歌唱、詩話、筆記引錄，總集選錄諸形式流傳當代，影響來茲。⁸⁰

8、吳曾《能改齋漫錄》

吳曾《能改齋漫錄》，《苕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引述之，皆作《復齋漫錄》。蓋此書編成，約在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四至二十七年間（1154-1157），「書甫鋟木」，即遭禁毀。《苕溪漁隱叢話》後集成書於孝宗乾道初年，值毀版之後，為避時忌，故書名改為《復齋漫錄》。⁸¹據考證，《復齋漫錄》於南宋之傳播，最少有四種版本：十八卷本、十三卷本、二十卷本，以及紹熙元年京鏜十八卷刪節本。增訂成書，當在孝宗隆興乾道間（1163-1165）。⁸²吳曾論詩，推崇新變、反對蹈襲，注重煉字煅句，追求警策，提倡詩不厭改。論其價值，《四庫全書總目》以為「幾與洪邁《容齋隨筆》相埒」。其評論點化與改造，分辨蹈襲與雷同，推崇山谷詩「一洗萬古凡馬空」，「豈肯教人以蹈襲為事乎？」捍衛江西詩法，尊尚黃庭堅詩，自是宋詩宋調之追隨者。

9、黃昇《玉林詩話》

《玉林詩話》，黃昇叔暘所著，玉林為其字號。《詩人玉屑》徵引其書，凡 33 條，稱為《玉林中興詩話補遺》，蔡正孫《詩林廣記》亦徵引之，凡五條。黃昇曾為《詩人玉屑》作序，《詩人玉屑》亦多徵引其書，可推《玉林詩話》成書當在淳祐五年（1244）以前。《玉林詩話》以品評南宋詩人詩作為主，推崇自然、平淡、含蓄，追求「存至味於淡泊」之作品。嚴分師承與蹈襲之殊異，欣賞新奇改造之佳句。品評諸家之餘，頗已運化江西以故為新、奪胎換骨、點鐵成金諸詩法於詩論中。

10、蔡條《西清詩話》

蔡條《西清詩話》，《詩人玉屑》徵引 26 則。南宋其他詩話筆記亦多所徵引，如《詩話總龜》徵引 22 條，《苕溪漁隱叢話》徵引 81 條，《詩林廣記》27 條，《竹莊詩話》18 條，《能

⁸⁰ 王友勝：〈宋人對蘇詩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蘇軾研究史稿》（長沙：岳麓書社，2000.5），第二章頁 28-33。

⁸¹ 〔宋〕吳曾：〈出版說明〉，《能改齋漫錄》，同註 51，頁 3-4。

⁸² 李裕民：〈十六種宋人筆記成書年代考〉，同註 69，頁 369。

改齋漫錄》11條，《野客叢書》6條，《優古堂詩話》、《庚溪詩話》、《草堂詩話》等，亦皆徵存一則。其傳播之廣，流布之遠，可以想見。⁸³南宋曾敏行《獨醒雜志》卷二稱：蔡條「作《西清詩話》一編，多載元祐諸公詩詞。」臣僚論列，以爲條「所爲私文，專以蘇軾、黃庭堅爲本，有誤天下學術」，因而落職。又據《宋會要輯稿》稱：「宣和五年（1123）九月……蔡條勒停。以言者論其撰《西清詩話》，學術邪僻，多用蘇軾、黃庭堅之說故也。」⁸⁴由此觀之，《西清詩話》稱引蘇、黃，自是宋詩之推崇者，宋調之助成者。其論詩，標榜自得，強調詩興，追求變態，提示「丹青吟詠，妙處相資」；作詩用事，如水中著鹽；以俗爲雅，點石化金，與東坡、山谷詩風，固有相互發明之處。

11、釋惠洪《冷齋夜話》

釋惠洪《冷齋夜話》大抵完成於徽宗崇寧、政和間（1102-1113）。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有著錄，《詩人玉屑》徵引25則。日本東洋文庫藏有五山版《冷齋夜話》十卷，川瀨馬一認定爲日本鎌倉末期之覆宋版。卷末刊語有「癸未」二字，當即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已東傳至日本，雕版傳播於東瀛。⁸⁵論詩多稱引元祐詩人，尤以蘇軾、黃庭堅爲主，蘇、黃詩中又以闡發黃庭堅詩學居多。後人指稱「奪胎換骨」爲黃庭堅詩法，亦獨見於此書之引述。既傳播於東瀛，乃影響日本江戶詩話之論述內容。另外，書中尚提及句中眼、造語、妙觀逸想、詩用方言、言事不言名、天趣、奇趣、象外句、含蓄等等。要之，《冷齋夜話》論詩，基本傾向於蘇、黃，多爲江西詩法張本。

12、葉夢得《石林詩話》

葉夢得《石林詩話》之成書，《宋詩話考》以爲大約在高宗建炎初年（1127-1128），南宋初即流傳於世，《苕溪漁隱叢話》載錄80餘條，《詩人玉屑》亦徵引25則。就宋刻版本言，有一卷、三卷之分，又有《津逮》本、池陽刻本之別。此書宋時流傳，最少有二本，《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均有著錄。元陶宗儀《說郛》本，亦分三卷，足見其傳播流布之一斑。其書論詩十分推崇王安石，而於歐陽脩、蘇軾、黃庭堅多所品題。雖有褒貶抑揚，然評論多客觀公允，並不以黨見分高下，論是非。其他，如對於江西諸子追求語工字奇，蘇軾、黃庭堅用事過於生澀，論衡亦多持平。其書品評詩歌，大抵重內容，輕形式；貴自然，反雕琢；重氣格，反纖弱；貴創新，反因襲；貴含蓄，忌顯露。其中，提示「禪宗論

⁸³ 羅根澤：〈附錄·兩宋詩話輯校敘錄〉，同註70，四、「西清詩話」，頁924-925。

⁸⁴ 〔清〕徐松輯，苗書梅點校：〈職官〉，《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六九之十三。

⁸⁵ 張伯偉：〈前言〉，《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4），頁3。

雲門有三種語」，所謂隨波逐浪句、截斷眾流句、涵蓋乾坤句，以禪喻詩，借此以言作詩之不落言詮，不拘成語，以及詩之自然渾成等蘊藉之美。下開嚴羽《滄浪詩話》以禪喻詩之先河。⁸⁶由此觀之，宋初以來詩話重紀事而輕詩藝，至《石林詩話》而文風轉變，詩學理論之闡發逐漸增強，中經《苕溪漁隱叢話》而紀事評論兼半，至《詩人玉屑》而大量輯錄詩格、詩法、詩藝、詩論，《石林詩話》當為轉捩關鍵。

（三）《詩人玉屑》與詩法詩藝之體現

由此觀之，《詩人玉屑》引述宋代諸家詩話，徵引較多，數量在 25 則以上之詩話，如《苕溪漁隱叢話》、《王直方詩話》、《誠齋詩話》、《白石道人詩說》、《東坡詩話》與《東坡七集》、《復齋漫錄》、《西清詩話》、《冷齋夜話》、《石林詩話》諸書，大抵除寫本（抄本）外，尚有雕版印本「易成、難毀、節費、便藏」諸優良，以及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效益，自有利於傳播與接受。其他詩話或者只以寫本流通，仰賴其他詩話筆記、類書、叢書之徵引，故容易散佚不全。唯上述十二種詩話，由其談詩旨趣，可分為兩大類：其一，批評蘇軾、黃庭堅以及江西詩法之詩話，如葉夢得《石林詩話》、嚴羽《滄浪詩話》，或直斥詩病，或揶揄得失，品評客觀公允，故深獲魏慶之編著《詩人玉屑》之印可，權作南宋文風詩潮主詩法，尚詩藝之對照，探討唐宋詩之異同利病，此中亦可獲得左券。其二，其餘十部詩話，論詩大抵尊尚蘇軾、黃庭堅，師法杜甫、陶淵明，宗主宋詩與宋調，提倡詩法、詩藝，由於切中當代品味，貼近南宋詩人審美情趣，暗合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原理，滿足書商暢銷和獲利之考量，故提倡江西詩法，推揚陶、杜、蘇、黃之詩話，除寫本流傳之外，大多有機會雕版印行，開拓許多傳播接受之渠道。畢竟，詩話倡導江西詩法、詩藝，是南宋「當時最多人感興趣的著作」；「媒介即信息」，興味與詩潮，影響書商對印本之選擇；獲選為雕版之詩話，實已隱含而體現當代之品味。從《詩人玉屑》徵引南宋以來諸家詩話之多寡與偏向，以考察南宋詩話之傳播與接受，探討《詩人玉屑》對宋代詩學信息之接受與反饋，多可見一斑。

《詩人玉屑》徵引數量在 25 則以下，15 則以上之詩話，其於當代之傳播與接受，信息之接受與反饋，亦大抵如是：《分甘餘話》、《漫叟詩話》、《童蒙訓》、《潛溪詩眼》、《後山詩話》等，發揚蘇、黃詩學，張皇江西詩法、詩藝者也，除寫本外，多有印本傳播。魏泰《臨漢隱居詩話》、黃徹《溪詩話》、蔡居厚《蔡寬夫詩話》三書，不滿蘇、黃，批評江西，揶揄諸家利病；同時又探討詩學之內容思想、審美意識，不盡然談論詩法、詩藝、詩格。《臨

⁸⁶ 羊春秋：〈葉夢得《石林詩話》〉，吳文治主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名著題解》，同註 73，頁 155。張連第、林珂、梅運生、漆緒邦編著：〈葉夢得《石林詩話》〉，《中國歷代詩詞曲論專著提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10），頁 71-72。

漢隱居詩話》批評史事用典，不滿苦吟，反對以文字爲詩，分辨造語與蹈襲。黃徹《碧溪詩話》盡心於「有補于時，有輔于名教」，且其精詣，《宋詩話考》以爲：「在詩格詩例方面，另出手法，以創爲語法修辭之規律。」而品評諸家，以杜甫爲宗。蔡居厚《蔡寬夫詩話》推崇陶淵明、杜甫，論詩崇尚自然，抨擊妄立格法，用事深僻之流弊，已隱約針砭江西詩法。《詩人玉屑》斟酌正反，取捨得失，合爲一編之中，兩宋詩學尊唐、主宋，宗江西、反江西之信息，要皆有或多或少之反饋與體現。

自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九經、正史刻本，其後趙希弁（1249 年在世）《讀書附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踵事增華，亦著錄刻本，知南宋寧宗（1195-1224 在位）、理宗（1225-1264 在位）時，刻本圖書數量已超過寫本，漸成圖書傳播之要角。至度宗成淳間（1265-1274），廖瑩中世綵堂校刻《九經》，取校二十三種版本，清一色爲刻本，無一寫本，印本幾乎取代寫本，成爲圖書出版之主流。⁸⁷刻本寫本之競妍爭輝如此，依據「媒介即信息」之說法，南宋以來之時代風潮，追求法式規格，注重矩矱模範，作爲文學與藝術創作入門有成，進階有序之依憑，影響所及，詩話之編寫自亦有所反饋與體現，嘗試考察南宋諸目錄學、版本學，詩話著錄之多寡，正足以反映個中消息。

晁公武（？1105-1180？）《郡齋讀書志》完成於紹興淳熙間（1151-1187），卷二十列有「文說類」，著錄才九種。⁸⁸陳振孫（1183-1249）《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二，別出「文史類」，著錄《文心雕龍》、唐人詩格及歐陽脩等宋人詩話，凡六十六種。⁸⁹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卷七十六〈經籍考〉，亦列有《文史》一類，著錄文論、詩格、句圖、詩話、四六話等書，凡六十九部。⁹⁰元脫脫（1314-1355）《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藝文八〉，亦蕭規曹隨，列「文史類」，著錄九十八部，六百卷。除詩格、賦格、文格、史例外，宋人詩學文獻只著錄司馬光《續詩話》等十九種而已。⁹¹從上述著錄之嬗變消長看來，詩格、句圖、賦格、文格、示例之始終受到關愛重視；以及闡揚江西詩法之詩話較多著錄，張戒《歲寒堂詩話》推崇唐詩，主張言志、情真，批評蘇黃詩歌「預設法式」；⁹²嚴羽《滄浪詩話》推崇唐詩，標榜興趣、妙悟，批判江西詩病「直取心肝創子手」。二家詩話未見著錄，與當時

⁸⁷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三章第五節，頁120。

⁸⁸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卷二十「文說類」、卷二十二「文史類」，頁641-651。

⁸⁹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2），卷二十二，「文史類」，頁641-651。

⁹⁰ [元]馬端臨著，華東師大古籍研究所標校：《文獻通考·經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6），卷七十六，「文史」，頁1812-1828。

⁹¹ [元]脫脫等撰：《宋史》、《二十五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二百九，〈藝文八〉，頁5408-5411。

⁹² [宋]張戒撰，陳應鸞校箋：《歲寒堂詩話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0.3），〈前言〉稱：南宋之史家、目錄學家，元人所修《宋史》，均不著錄張戒的詩話，《歲寒堂詩話》在南宋和元代寂然無聞，鮮為人知。頁11。

主流詩潮相背相左，「媒介即信息」，致其如實反應如此歟？值得進一步考證。

覆按宋代詩話之金針度人，心得分享；乃至於《詩人玉屑》標榜「升高自下之方，繇粗入精之要」；提供煉字選字之借鏡，下字用字之靈方，乃至於成法、活法之出入，規則、自由之依違，舉凡詩格詩法之強調，要皆示人以下學，期許詩人因之而上達。北魏祖瑩云：「文章當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不可寄人籬下。」宋代詩話示人以規矩準繩，勉人以意新而語工，其用心留意，亦如袁枚、祖瑩所云。今觀《郡齋讀書志》、《讀書附志》、《直齋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之圖書著錄、版本流傳，知《詩人玉屑》之揭示詩法，強調詩藝，乃南宋以來江西詩風滲透與反饋之體現，宋詩與宋代詩學注重藝術技巧，往往示人以金針之風習，由此可見一斑。

四、結論

詩話始於北宋歐陽脩，其後繼作者或主論詩及事，或主論詩及辭，雖有輕重詳略之別，然多兼而有之，大抵為評論文學之筆記。迨南北宋之交，踵事增華，變本加厲，至葉夢得《石林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敘事論詩各居其半，逐漸側重談論詩藝，提示詩法，揜摭詩病。下迨楊萬里《誠齋詩話》、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嚴羽《滄浪詩話》則純粹倡詩法、談詩藝、說詩格、戒詩病，品題詩人，評騭詩歌。《詩人玉屑》集宋初以來詩評之大成，示海內詩人詩法之靈方，詩病之禁忌，號稱「詩家之良醫師」。《詩人玉屑》雖曰述而不作，然選錄諸家詩話去取詳略之間，必有抑揚予奪，自有裁斷與評價。即器求道，其道不遠。

宋詩特色之形成，歷經典範選擇、學古通變、自得到、自成一家之過程。加以才人代出，各領風騷，王安石、歐陽脩，王安石、蘇軾、黃庭堅及江西詩人風起雲湧，於是北宋元祐前後，疏離唐詩本色，建立自家特色之宋詩風格逐漸形成。此種詩歌創作之風潮，亦或先或後體現於詩話之編著上：典範陶杜、宗法蘇黃之詩話，固然標榜詩法，稱述詩藝；而尊尚唐詩唐音，提倡興寄教化之詩話，則揜摭利病得失，批評預設法式，稱揚直尋而貶抑補假。宗陶、杜，學蘇、黃，蔚為南宋文風詩潮之主流，與詩壇文壇之創作相互輝映，相得益彰，南宋詩話亦如實反映此種信息。而推崇盛唐，師法晚唐，思矯江西之詩病者，亦反饋於詩話中，作為異端而崛起其間，時作不平之鳴，時發反正之論。

雕版印刷作為商品經濟之一環，具有「通過創造新產品或新工藝來吸納新思想，並將這些思想轉變為新的經濟價值的能力。」⁹³運用於宋代之知識傳播，自然成為「變革之推手」。

⁹³ 燁子主編：〈技術變革與經濟增長——傑佛里·薩克斯教授在哈佛演講實錄〉，《哈佛名人講座》（臺北：新潮社文化公司，2004.1），頁134。

日本京都學派提出「唐宋變革」論、「宋代近世」說，以文化轉型解讀唐宋種種變革之現象，立說堪稱穩健得體。唯造成變革與轉型之觸媒為何？學界探討多語焉不詳。今提出本文，借鏡谷登堡活字印刷書在中古歐洲所造成之變革效應，以類比雕版印刷在兩宋圖書流通所生發之傳媒影響，兩者是否同理可證？又參考目錄學、版本學、傳播學、接受學之理論，以及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原理，考察《詩人玉屑》徵引諸家詩話，所生發之傳播與接受、信息與反饋之關係。發現《詩人玉屑》徵引較多之詩話，如《苕溪漁隱叢話》、《王直方詩話》、《誠齋詩話》、《白石道人詩說》、《東坡詩話》與《東坡七集》、《復齋漫錄》、《西清詩話》、《冷齋夜話》、《石林詩話》諸書，大抵除寫本（抄本）外，尚有「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化身千萬，無遠弗屆之雕版印本，自有利於傳播與接受。其他詩話或者只以寫本流通，仰賴其他詩話筆記、類書叢書之徵引，故較易散佚不全。

除《石林詩話》、《滄浪詩話》外，《詩人玉屑》徵引數量最多者尚有十部詩話，論詩大抵尊尚蘇軾、黃庭堅，師法杜甫、陶淵明，宗主宋詩與宋調，提倡詩法、詩藝，由於切中當代品味，貼近南宋詩人審美情趣，暗合商品經濟供需相求之原理，滿足書商暢銷和獲利之考量，故提倡江西詩法，推揚陶、杜、蘇、黃之詩話，除寫本流傳之外，大多有機會雕版印行，開拓許多傳播接受之渠道。畢竟，詩話倡導江西詩法、詩藝，是南宋「當時最多人感興趣的著作」；就「媒介即信息」而言，興味與詩潮，影響書商對印本之選擇；獲選為雕版之詩話，實已隱含而體現當代之品味。從《詩人玉屑》徵引南宋以來諸家詩話之多寡與偏向，以考察南宋詩話之傳播與接受，探討《詩人玉屑》對宋代詩學信息之接受與反饋，多可見一斑。

至於《石林詩話》、《滄浪詩話》批評蘇、黃詩病，掎摭江西詩派得失，不妨看作信息之反饋回授。控制論為傳播理論之一，以「反饋」概念為依據，強調「通過一個系統以往運行情況的信息，來控制這個系統的未來行為」。在傳播系統中，一個接受者（信宿）回應傳播者（信源）從前信息，所生發的效果，就叫「反饋」。維納的控制論，涉及信息如何在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間進行流通，以便相互影響。其間循環的因果關係，可簡化為 A 造成 B，B 造成 C，而 C 又造成 A。由此可見，因果循環的效應，是 A 造成了它自身。論者稱：「受江西詩派的影響，有關『詩法』理論，也在宣揚與批判的鬥爭中，經過自我改造，而逐漸走向靈活與完善。」⁹⁴此即傳播系統中，「一個接受者（信宿）回應傳播者（信源）從前信息，所生發之效果」，所謂信息「反饋」者是也。

換言之，南宋詩話自成一個傳播系統，《石林詩話》、《臨漢隱居詩話》、《滄浪詩話》作為南宋詩學之反響，商榷蘇軾、黃庭堅詩病，批判江西派近代諸公之流弊（A）；勢必影響

⁹⁴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第三編第二章第五節〈宋詩話的價值、地位和貢獻〉，頁 517-518。

崇尚蘇、黃，師法江西之詩人詩話創作及編寫方向（B）；於是造成：創意造語、自得自到與興寄妙悟、別材別趣等詩家語之提倡，蔚為詩話標榜之指標（C）；經過輪迴影響，此種文風詩潮，交相反饋回授於詩話中，體現於詩作中（A），宋詩宋調之形成因而有所造就。總之，信息反饋，因果循環之效應，乃造就了詩話之多元論述，與文學創作之新變自得。楊萬里《誠齋詩話》既突破江西詩派之藩籬，然又未盡脫江西詩法之影響；嚴羽《滄浪詩話》自矜為實證實悟，非傍人籬壁而來，夷考其實，卻又淵源有自。甚至入室操戈，殺鄧析而用其竹刑。⁹⁵傳播之效應，信息之反饋有以促成之。

宋代審美意識，標榜矩矱繩墨，境界追求卻又不止於規則模範，所謂「有所法而後成，有所變而後大。」建築學，有《營造法式》；書道，有《淳化法帖》；雜劇演出，亦揭示程式、法式；《春秋》書法、字說字解，皆講究「安排一字有神」；而詩學，有詩格詩法，可見重視法式，自是一代之風氣。由此觀之，宋代詩學注重詩藝、詩法，其消長與形成，與宋人審美追求「法式規範」大有關係。

⁹⁵ 郭紹虞：〈校釋說明〉，《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12），頁2。

引用書目

一、 傳統文獻

- 〔宋〕蘇軾撰，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宋〕張戒撰，陳應鸞校箋：《歲寒堂詩話校箋》，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 〔宋〕吳曾：《能改齋漫錄》，臺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宋〕朋九萬：《烏臺詩案》，臺北：宏業書局，1972年。
- 〔宋〕楊萬里撰，辛更儒箋校：《楊萬里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宋〕嚴羽撰，郭紹虞校釋：《滄浪詩話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 〔宋〕魏慶之：《校正詩人玉屑》，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
-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4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宋〕晁公武撰，孫猛校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元〕韋居安：《梅磴詩話》卷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
- 〔元〕馬端臨著，華東師大古籍研究所標校：《文獻通考·經籍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
- 〔元〕脫脫等：《宋史》，《二十五史》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
- 〔清〕紀昀、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 〔清〕徐松輯，苗書梅等點校：《宋會要輯稿·崇儒》，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

二、 近人論著

- 王水照：《鱗爪文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王友勝：《蘇軾研究史稿》，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

- 王兆鵬：〈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研究的六個層面〉，王兆鵬、尙永亮主編：《文學傳播與接受論叢》，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12。
- 王重民：《中國目錄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 王勇等：《中日「書籍之路」研究》，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靜安文集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3年，頁70。
- 王夢鷗：《古典文學論探索》，臺北：正中書局，1984年。
- 方彥壽：《福建古書之最》，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年。
- 四川大學中文系主編：《蘇軾資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田耕宇：《中唐至北宋文學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 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 李裕民：《宋史新探》，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李瑞良：《中國古代圖書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 吳文治主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名著題解》，合肥：黃山書社，1987年。
- 吳國武：《經術與性理——北宋儒學轉型考論》，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
- 周勛初：〈宋人發揚前代文化的功績〉，北京大學、四川大學主編《國際宋代文化研討會論文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10月，頁59-63。
- 林繼中：《文化建構文學史綱：魏晉——北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金鶚：《求古錄禮說》，袁咏秋等：《中國歷代國家藏書機構及名家藏讀敘傳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
- 柳立言：《何謂「唐宋變革」？》，《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1期（總八十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祝尙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 ：《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東亞漢籍研究論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年。
- ：《清代詩話東傳略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張高評：《宋詩之新變與代雄》，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1995年。
- ：〈北宋讀詩詩與宋代詩學〉，《漢學研究》第二十四卷第二期，2006年。
- ：《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臺北：里仁書局，2008年。
- ：〈宋代雕版印刷之政教指向——印刷傳媒之控制研究〉，《成大中文學報》第二十期，2008年，頁195-202。
- ：〈宋刊詩話總集與宋詩特色——兼論圖書傳播與詩分唐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學報》第45期，2009年6月，頁201-234。
- ：〈《詩人玉屑》論言用不言名——不犯正位與創意詩思〉，《山西大同大學學報》2009年第23卷第5期，頁47-52。
- 張連第、林珂、梅運生、漆緒邦編著：《中國歷代詩詞曲論專著提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
- 張健：《元代詩法校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魏慶之及《詩人玉屑》考〉，《人文中國學報》第10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23-167。
- 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5-71。
- 郭紹虞：《宋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宿白：《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
- 陳植鏗：《北宋文化史述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 章權才：《宋明經學史》，韶關：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
- 曾祥波：《從唐音到宋調——以北宋前期詩歌為中心》，北京：昆侖出版社，2006年。
- 曾棗莊：《蘇軾研究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
- 黃曉鍾、楊效宏、馮鋼主編：《傳播學關鍵術語解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
-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原載《國立編譯館館刊》一卷四期，1972年12月；後輯入《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7年，頁339-382。

- 葉國良：《宋人疑經改經考》，《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80 年。
- 楊新勛：《宋代疑經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 葛景春：《李杜之變與唐代文化轉型》，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
- 鄧廣銘：《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 蒙文通：《經史抉原·中國史學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 年。
- 劉方：《唐宋變革與宋代審美文化轉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 年。
- 劉尚榮：《蘇軾著述版本論叢》，成都：巴蜀書社，1988 年。
- 劉寧：《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 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錢鍾書：《談藝錄》，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88 年。
- 燁子主編：《哈佛名人講座》，臺北：新潮社文化公司，2004 年。
- 繆鉞：《詩詞散論》，臺北：開明書店，1977 年。
-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 年。
- 嚴紹盪：《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鉤沈》，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6 年。
- 顧易生、蔣凡、劉明今等：《宋金元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 E·M·羅杰斯(Rogers, E. M.) 著，殷曉蓉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年。
- 艾·郎諾：〈書籍的流通如何影響宋代文人對文本的觀念〉，沈松勤主編：《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98-114。
- 包弼德(Peter K. Bol) 著，劉寧譯：《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T' ang and Sung China*，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e'deric Barbier) 著，劉陽等譯：《書籍的歷史》*Histoire du livre*，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 費夫賀(Lucien Febvre)、馬爾坦(Henri-Gean Martin) 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The Coming of the Book*，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
-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黃約瑟譯文，劉俊文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內山精也：《蘇軾詩研究：宋代士大夫詩人の構造》，東京都：研文出版，2010 年。

Public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Sung Poetry in *Shih-jen Yü-hsieh*: Feedback and Quotations of Poetic Commentaries

Kao-ping Chang^{*}

Abstract

In *Shih-jen Yü-hsieh* (《詩人玉屑》), poet Wei Qing-zhi (魏慶之) of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collects the art of Sung literature in a nutshell; for example its criticism of Sung poetry's style, form, sentence structure, and weaknesses is said to be the essence of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literary highlights. This publication analyzes the canonic works of its time; through what it chooses not to say, it is clear to the readers of its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this paper, through scrutinizing the making-process of *Shih-jen Yü-hsieh* it is seen how Sung poetry employ the technique of the printing press to raise competition against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the result confirms what is later defined as the "Tang-Sung Restora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se publications were "easily produced, scarcely damaged, low in cost, effortlessly preserved," the printing press naturally became the "key to the Restoration"—thus such interaction between circulation of the work and its popularity reached its peak during this period. The literary movement of Sung, therefore, started to divert from its Tang inheritance, ultimately accomplishing the trend that "departs the Sung style from Tang poetry." From *Shih-jen Yü-hsieh*, I would like to extract various poems including *Tiaoxiyuyin Cong-hua* (《苕溪漁隱叢話》), *Wang-zhifang Shi-hua* (《王直方詩話》), *Chengzhai Shi-hua* (《誠齋詩話》), *Bai-shi Archive* (《白石詩說》), *Lingyang Chamber Poems* (《陵陽室中語》), *Tung-P'o Shi-hua* (《東坡詩話》) and *Fuzhai Man-lu* (《復齋漫錄》), most of them showing demonstrate their appreciation for Tao Yuan-ming (陶潛),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Du Fu (杜甫), Zōng-shī Su Shi (宗師蘇軾), and Huang T'ing-chien (黃庭堅), which trace back to the poetics of Jiangxi. As to understand the equivalence of “medium and message” (「媒介即信息」), reader response and critical acceptance must be brought into discussion. Several exceptions, such as (《石林詩話》), *Linhan Yin-Ju Shi-hua* (《臨漢隱居詩話》), *Gongxi Shi-hua* (《涪溪詩話》) and *Canglang Shi-hua* (《滄浪詩話》), are examples of Southern Sung's poets reflections of the dynasty's particular history. Out of *Shilin Shi-hua*, *Linhan Yin-ju Shi-hua* emerges; and from *Chengzhai Shi-hua* to *Shih-jen Yü-hsieh*, it is seen how the poets of Sung value the art of semantics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 of the poem, to which contributes to Sung poems' emphasis on “regulated formations.”

Keywords: media effect, Tang-Sung reformation, responsive message, semantics and poetics, Sung poetry, *Shih-jen Yü-hsieh*

